

中

胡丽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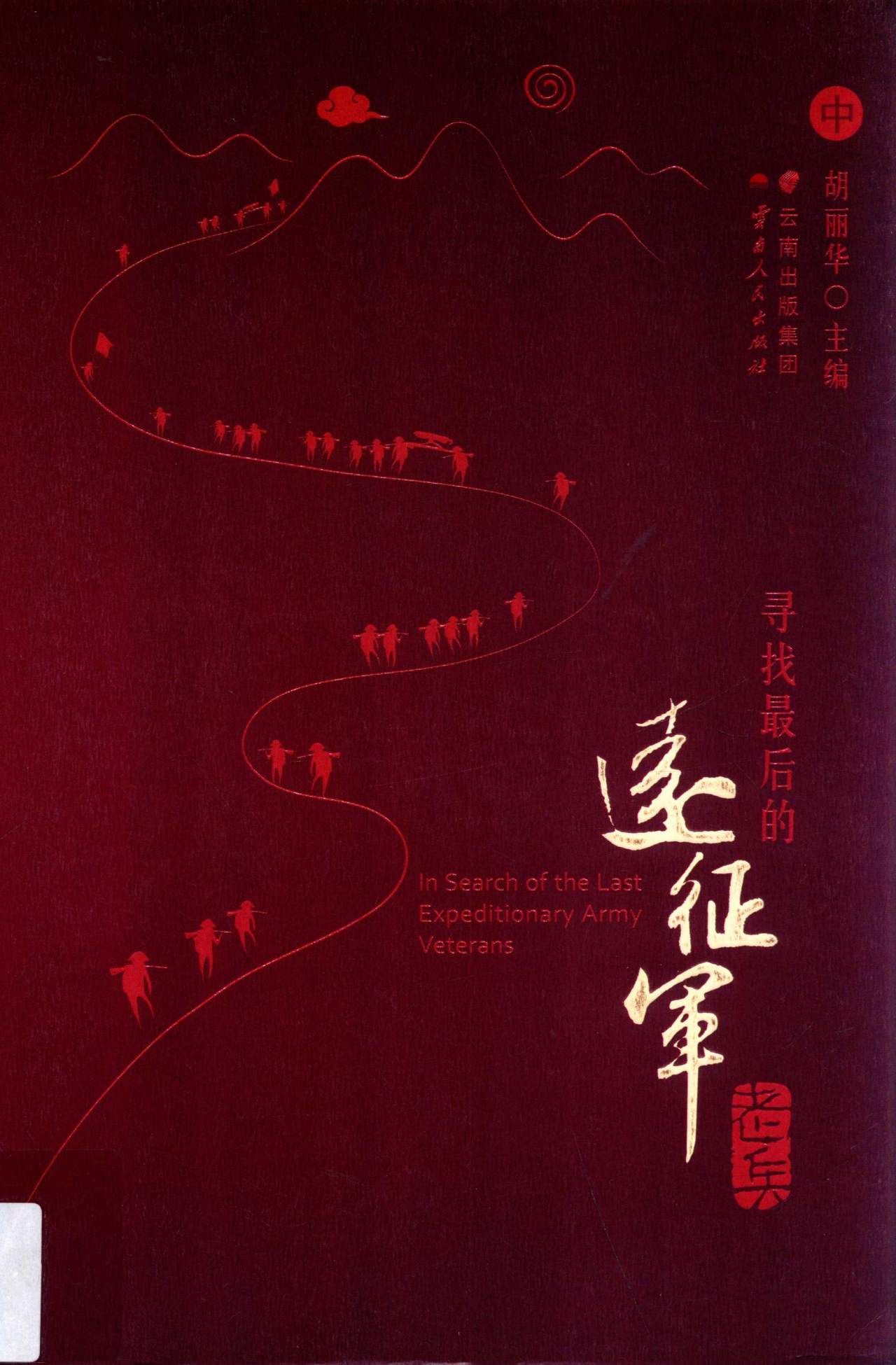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最后的

远征军

老兵

In Search of the Last
Expeditionary Army
Veterans



中

胡丽华○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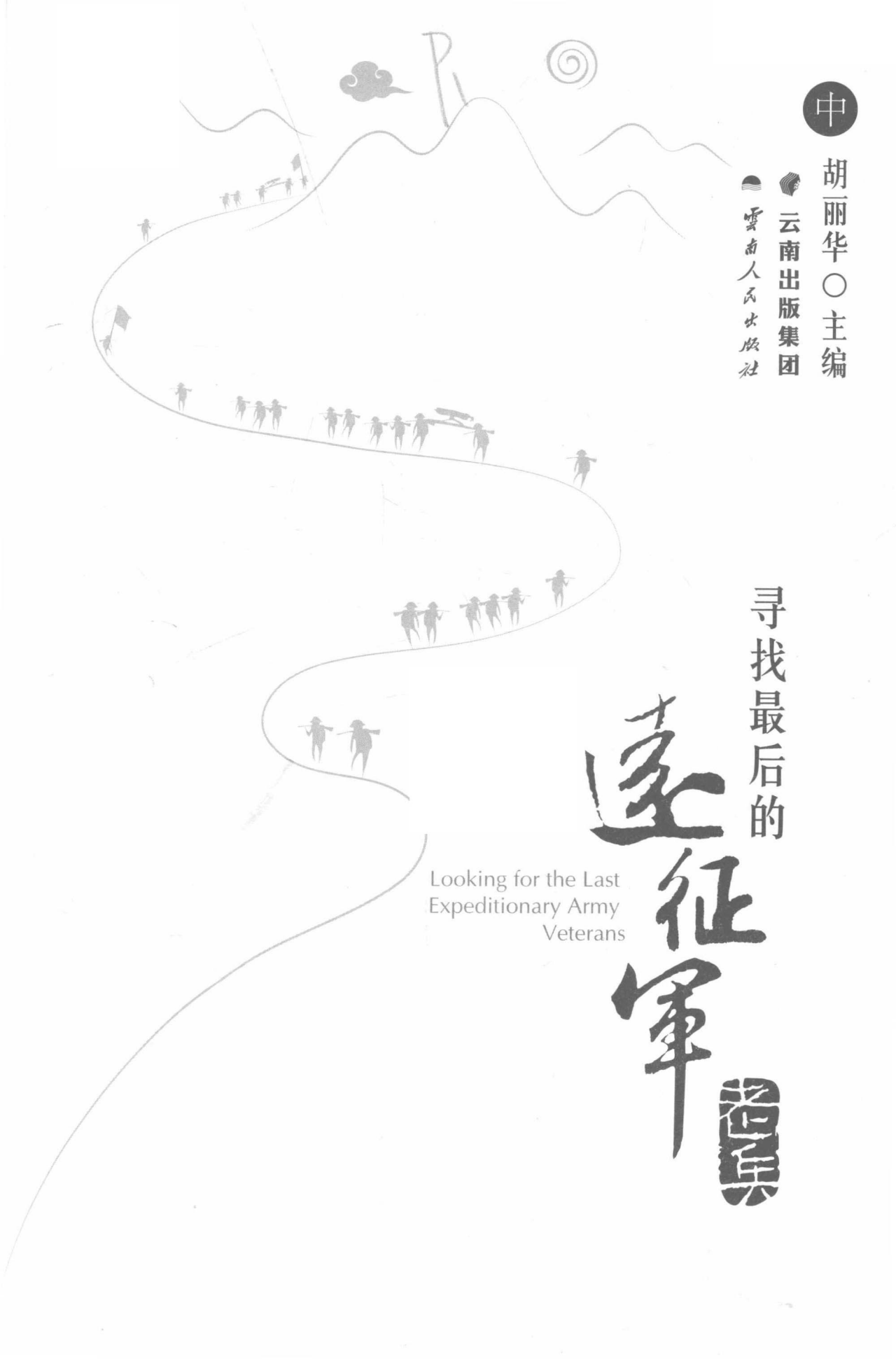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最后的

远征军

老兵

Looking for the Last
Expeditionary Army
Veterans





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宋希濂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期所组织的远征军分为两个时期，它的名称、作用和组织都不相同，杜聿明在另文已有详细说明。我于1941年11月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指挥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第六十六军及预备第二师。1942年2月，六十六军开往缅甸，另有驻在昆明东部曲靖的新编第三十九师归我指挥。1942年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偕军令部次长林蔚（兼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等人乘飞机赴缅甸腊戍和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会晤，当天飞机带回林蔚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说蒋要我担任入缅军的总指挥，希密作准备。3月4日，蒋由腊戍飞回昆明，又叫我仍然留在昆明，不去缅甸。但第一时期的远征军入缅败退后，从1942年5月直到1945年1月，所有滇西阻击战、怒江敌我对峙、第二时期远征军的训练及滇西反攻各役，我都参加指挥。本文就是扼要叙述以上各役的情况，基本上属于远征军第二时期的范围。

一、滇缅公路撤退的凌乱

1942年4月29日，入缅军后方的主要基地腊戍被日军占领。当腊戍吃紧的时候，入缅军各种车辆器材及伤病兵等纷纷向国内转运，而原在滇缅路线上的腊戍、畹町、芒市、龙陵等地所存储的物资，亦争先向后方抢运。还有缅甸侨胞逃回祖国的，还有一些到缅甸经商运带货物回国的，或乘车，或步行，同一个目的，就是拼命向后方逃跑。于是滇缅公路上，人车拥挤，途为之塞，车辆头尾相接，进退两难。沿途步行的人强制搭车，车辆每次前进，最多一二公里就被堵住，只好停下来等候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再走；可是刚走一小段还得停下来。这样一段一段的磨，车子不是交通的利器，反而变成堵塞道路的障碍物了。当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人说得最为真切：

“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都是车子……芒市前后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龙陵前后有20多公里走不通，满满都是车子。”

“三路纵队，四路纵队……谁也不肯让谁，一个顶住一个。”

“走一米，说不定要等多少时候……好多人只好摊开被褥在车子底下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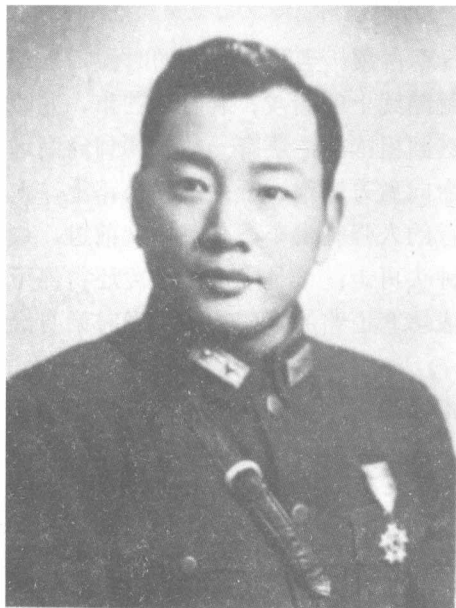
总括一句话，就是拥挤和混乱。

敌人东进的威胁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原来储放在畹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

仓库的大批物资是来不及运走了，有的就自动焚毁，黑烟滚滚，直冲云霄；有的仓库的看守人员早就逃跑了，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处置，变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我国人民血汗所换来的大批物资，在远征军溃败和后勤人员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丧失净尽，这是多么令人愤慨的事！

入缅军的核心指挥机构——参谋团，五天内由腊戍退到了保山，行程达一千多华里。而自腊戍到惠通桥丢弃的物资简直无法计数。原来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10倍到20倍。我当时曾派了两个参谋随军入缅，他们在给我的报告中对这种情形言之颇详，而且说得很具体，可惜我现在记不起那些家伙的姓名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到第三年，物价就开始急剧上涨。到1942年，许多东西都是涨了几百倍，大家都在叫苦，军队中绝大部分官兵的生活尤为艰苦。但蒋介石那时却拿出了大批的外汇来发给入缅部队。部队原来就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无数士兵的鲜血和人民的血汗填满了他们的私囊。当时沿着滇缅公路溃退的六十六军，我派几十名干部在保山、永平、下关一带收容他们。内中有不少的官兵向我控告了他们的军长张轸和师长刘伯龙、马维骥。根据他们提供的许多材料和当

时的情况来推断，他们3个人贪污的缅币卢比至少是十多万元（约合美元三四万元），这还是最低估计。根据这些情况和他们的不战而逃，我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建议将六十六军番号撤销，所有残部合编为一个师，并将军长张轸、师长刘伯龙、马维骥革职查办。蒋介石虽然很快批准了我的建议，但他们利用贪污得来的大量金钱，在重庆、昆明两地公开地大请其客，秘密地大送其礼，最后经何应钦（他是国民党政权高级军职人员中最贪污、最腐败、最无能的典型人物）的庇护，张轸、刘伯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且很快就另派新职，马维骥只关了一下，很快也就开释了。负失败重大责任的参谋团，不但没有检讨错误，而在参谋团中几乎是支配一切的参谋处长萧毅肃居然于6月间回到昆明后，利用团长林蔚昏庸，用林蔚的名义为自己向军委会请奖，说他筹谋有功，破坏惠通桥有功。军委会根本不审查事实，很快就予核准，由重庆国民政府发给萧毅肃三等云麾勋章一枚，并



本文作者、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宋希濂



登在当时各大报上（1942年八九月间）。我看了这段消息，十分愤慨，曾在日记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原文记不清，大意如此）：“参谋团的许多作战计划都是萧毅肃做出的，入缅甸十万之师在这样的策划下几乎全军覆没。如果说他有功，那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确是有功的，应该由日本天皇发给一枚勋章才对。至于说到惠通桥之敌，是三十六师的官兵流了许多鲜血击退的，萧毅肃当时坐着汽车拼命向后逃跑，有何功之可言？这实在太没有是非了，但林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

二、惠通桥的阻击战

敌军第五十六师团攻占腊戍后，迅即组成了一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汽车百余辆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着滇缅公路挺进。原在滇缅公路上的部队，在敌军虚张声势的威胁下，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狼狈溃逃，遂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5月3日，滇缅边境的要地畹町即告失守，遮放、芒市、龙陵相继陷落。到5月5日，敌军就进抵怒江的惠通桥，并有一部渡过了怒江。当时不仅滇西局势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连昆明也震动了。那时驻在云南的美国志愿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于5月4日给蒋介石的一个报告中说：“根据美空军的侦察报告，在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的速度计算，大约十天就可以到达昆明了。”

当时我所部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原驻在西昌一带，已于4月下旬奉命徒步开往滇西祥云附近集结。由于谣言纷纷，人心不安，我于5月4日下午5时到五华山昆明行营会晤龙云（我当时系归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指挥）及刘耀扬（行营参谋长）探询入缅甸方面的真实情况并筹商对策。行营方面因和林蔚的参谋团及入缅甸指挥部均无联系，所得到的消息多是片断的或片面的。唯一较可靠的消息，即是保山县政府的一个电报所说畹町失守和芒市、龙陵吃紧的情况。重庆军事委员会方面没有任何指示，行营方面亦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是日深夜，我突然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腊戍、畹町均已失守，敌人乘胜沿滇缅公路东进，林蔚的参谋团已有一天多没有电报报告，不知到了何处，要我迅即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络。同时他叫我迅即征调车辆，将已到达祥云的三十六师先运，沿滇缅公路西进阻击敌军，并陆续运送昆明附近的部队。我随即驱车到郊外黑林铺滇缅公路运输总局洽商。兼任总局长俞飞鹏未在，我把副局长和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喊醒来，把情况告诉他们，要求所有一切军运商运的车子均应暂时停止，凡能够使用的车辆都要服从这一紧急任务。他们立即向所有各主要场站查询车辆情况。我大约停了两个钟头，和他们作了详细的计算，他们答应于5月5日至7日3天内提供550辆卡车交本集团军运输，并于以后陆续征调车辆运送。我计算3天内大约可以运出两个多师，连夜和在祥云的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通电话，要他的部队整装待运，并叫他带少数人先行，去赶上已经乘车西进的该师一〇六团，沿路打听情况，对冒进东犯的敌军予以迎头痛击。5日，蒋介石及军令部和我通电话，商定叫驻在滇南的第九集团军关麟征所辖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开来昆明接替防务，而命本集团军陆续西移。我于6日下

午3时乘军用飞机到了祥云，随即偕副参谋长陶晋初等乘车西行，7日上午3时到了保山，打听到参谋团所住的村庄，随即驱车前往，和林蔚、萧毅肃等会见。一〇六团已于5月5日上午3时到达惠通桥东岸高地，与敌军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为了争夺公路两侧的最高山顶，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军浴血奋战，反复冲击，于是日傍晚确实控制了公路两侧一带的最高山峰。但渡过怒江的敌军四五百人，仍继续占据惠通桥东岸的一带山地顽抗，其西岸的炮兵不断向我轰击。三十六师陆续运到的另一个团（一〇七团）也已投入战斗，正准备向东岸之敌攻击。7日下午我偕陶副参谋长、杨参谋及一个卫士乘小汽车前往惠通桥东岸三十六师李师长的指挥所。保山到惠通桥70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山地。车行到由旺附近（离惠通桥还有30多公里），被在上空盘旋的敌军4架飞机发现了，我们立即下车走入附近的树木里隐藏。敌机低空扫射，没有打着我们，在汽车附近丢了3颗小型炸弹，也没有伤坏车子。敌机走后，我们继续行进，不久就到了李师长的所在地。我们在山顶观看了惠通桥附近的地形，形势是这样的：怒江两岸，山势陡峻，两岸公路，无论自东而西或自西而东，都是由山上蜿蜒而下，曲曲折折地转几十个弯。大约走十二三公里才能到达惠通桥，过桥之后，又要曲折而上。怒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惠通桥桥东桥西，遥遥相望，隔岸对立，能相呼应。5月5日晨敌人占据了惠通桥西岸的高地——松山，在公路的另一弯处架起了重炮，向东岸公路猛烈轰击，遂使自桥边至山顶一段的车辆——约有100余辆，完全不能开行，车上的人都下车向公路两侧的荆棘丛林里绕道逃往后方。大部分的车辆被敌军的燃烧炮弹命中焚毁，物资更是损失不少（这些车辆和物资中，以重庆军委会军政部兵工署的材料为最多）。三十六师于6日下午曾继续向东岸之敌攻击，又攻下了两个山头。敌军这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了，仍然据守惠通桥头两侧的一些高地负隅顽抗。我当和李师长及各团长商定将全师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射击，并将一些重机枪的火力点作了重新部署，预定8日上午发起攻击，务求一举将东岸残敌彻底歼灭。我于当晚回到保山。8日上午，三十六师攻击部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复冲杀，有的和敌人进行了白刃战，最后除有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部被消灭，到此完全肃清了东岸之敌。自5日至8日间的战斗，先后缴获敌人轻重机枪、步枪共80余支。这样，打击了日军继续东进的企图，保持了保山这个重要基地，形成以后一个时期在怒江对峙的形势，争得了准备反攻的时间。这一仗虽然是个小规模局部战争，但就战略意义来说，却是很有价值的。

8日，我到保山城及附近观察。保山是一个南北75华里、东西宽25华里的平坝，四周都是高山。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曾到过这里，有点将台、诸葛营等遗址。这个县产粮颇多，称为滇西的粮仓。保山城5月4日、5日遭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城内房舍被烧达十分之七，尤以一条较为繁华的大街几乎完全被燃烧弹焚光了，还有不少被炸死的人的尸体没有掩埋。在城东南一带，聚集着由缅甸、畹町、芒市、龙陵一带退到保山来的许多难民。这些难民中好些在快到保山的时候，遭到云南地方部队龙奎垣旅的抢劫。这个龙奎垣旅原驻在滇缅边境及保山一带，听说敌人来了，拼命向后逃跑，沿途洗劫，在保山还抢了银行及许多商店，真是无恶不作。难民有的财产行李全丢光了，有的几天没有吃到饭，有的生了病，大多数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为状至惨。这里面有不少人是在缅甸的华侨，他们由于热爱祖国，不甘心



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放弃了在缅甸的产业和工作回到祖国来，哪知不仅得不到当时的政府的照顾，反而遭受这种种的损失和折磨。同日下午，我进行了下列两项工作：

1. 找了保山县长和地方上的几位士绅及负责管理公路运输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请他们征集一些人将街上尸体掩埋，破砖烂瓦打扫一下；在城内或城郊附近找出一些空房给难民暂时居住，确实无力维持生活的人应暂时由县府供给吃饭；所有东开的军车除装运急需运送的军用物资外，尽可能的免费装载要往下关、昆明的华侨和难民。这些事情后来是做了，但是做得不够好，例如仍有一些司机向华侨勒索车票等情形出现。

2. 派了几个参谋副官到保山坝子里各村庄收容散兵。这些散兵都是从缅甸溃退回来的，三五人一群，也有几十人一群，大多纪律废弛，跑到乡村里乱抢食物，也不给钱，甚至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有任意放枪的，弄得乡村惊慌不安。这项收容工作十分重要。我又迅即从昆明调来了几十名干部，分别在保山、永平、下关一带进行收容，先后收容了几千人和许多武器。

三、怒江对峙

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施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两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因此军令部于5月13日下令给第十一集团军反攻腾冲（腾冲系于5月10日被敌军占领的）、龙陵，并派一部分兵力向腾冲西南地区之莲山、盈江、梁河等地前进，另派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间地区推进，迎接入缅军第五军的部队回国。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部队的情况是：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正面，预备第二师已运送到保山集结完毕，第八十八师正在运输中，仅有一个团到了保山，第八十七师尚在昆明待运，新编第三十九师是否西开尚未确定。当即命已到达保山集结完毕的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在惠人桥附近渡河向腾冲前进。第八十八师胡家骥部于17日集结完毕，由于正面渡江不易，乃命该师在惠通桥下游的攀枝花渡江绕攻龙陵，三十六师派一部渡江攻击当面之敌。随后八十七师到达后，也派出一个团跟随八十八师向龙陵攻击。到5月22日，指派担任反攻腾冲、龙陵、松山的部队已完全渡江完毕，并已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我预备第二师并派出一部深入腾冲西南地区。第五军的二〇〇师高吉人部主力及黄翔所指挥的第五军两个补充团2000余人，就是受到预备二师的掩护，经腾冲北面到达怒江上游的泸水县，又渡江回到保山附近的漕沟休整的。

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的各部队于23日起开始向腾冲、龙陵、松山之敌攻击，并分别以一部攻击腾龙、龙松公路上的敌方各据点。这种攻击由于没有炮兵，不能摧毁敌军的工事，以及补给上的不充分（例如各种弹药粮秣都赶运不上去），只持续进行了5天，遭受相当的伤亡，仅攻下两条公路间的一些小据点，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28日第八十八师的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敌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

得知敌军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1.5万人至2万人。我当将此文件送到参谋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军令部，随着蒋介石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西岸从事游击。这样，滇缅公路上的战争，遂演变成怒江对峙的局面。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1944年5月反攻时为止。在这期间也有几十次的小规模战争，但每次使用兵力都不超过一个师。

林蔚率参谋团人员于6月10日离开保山返回昆明，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没有成立以前，我就单独担负起滇西战场指挥的责任。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作战方面经常使用约一个师的兵力控制腾北地区掩护右侧，并不断袭击腾冲一带之敌外，同时经常派出约一个团的兵力袭击芒市至龙陵、松山间之敌，获取敌军情况，破坏敌军交通，以及征购腾龙一带的粮食以解决一部分的军粮外，还有几项较为重要的工作，简要叙述于下。

1. 整训部队。第十一集团军是以第七十一军（辖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这个部队和我有多年的历史关系）、第六十六军（下辖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新编第三十八师）两个军为基干组成的。1942年2月，第六十六军入缅作战失利。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其残部退往印度。张轸指挥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被敌人的快速部队冲击了一下，就完全溃散了。他们大多是几十人或三五人一群，沿着滇缅公路的两侧向东逃跑，到处抢劫，弄得鸡犬不宁。我派了大批人员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他们，严禁他们再向东去，到6月底共收容了5000多人。为了整顿军纪，申明赏罚，我向重庆军委会建议：将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均革职惩办；将第六十六军及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番号均取消，保留新编第二十八师的番号，以收容的5000多人编成，并将新编第二十八师归入第七十一军的建制，将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归本部直接指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甘丽初的第六军（辖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在缅甸被日军击破，溃不成军，由缅甸的景东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残部仅存6000多人。军委会将这6000人并编入九十三师，调驻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免去甘丽初第六军军长的职务，并取消暂编第五十五师的番号（第四十九师保存其基干，调到昆明，归昆明防守司令部予以整补）。同时，军委会发表黄杰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第六军以预备二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组成。第六军的直属部队及新编第三十九师均于是年秋开到滇西。是年冬第五十四军（军长方天，下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亦由昆明开到祥云、弥渡一带，暂归我指挥。这样，当时我在滇西战场所指挥的兵力为：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五十四军及第三十六师。

1942年5月，入缅军的溃退和日军的滥肆轰炸，给滇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热带病——虎列拉的传入，更给滇西人民加上可怕的灾难。保山一带村庄的居民在6、7两个月里死于这个疫症的有1000多人。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两天之间死了六七十人；没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包裹掩埋。我和当时到了保山的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那时军队



全都注射了防疫针，感觉情形不严重，当命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由于人员和药品的不足，我和李根源分别向昆明的一些医疗机关发出紧急呼吁，先后得到了帮助。这样，到7月中旬，这个疫症才没有继续发展。

在这时期，除以一部军队守备怒江各要点，并派出一部在怒江西岸游击外，大部分驻在保山、永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向军政部要得20000多名补充兵，充实各师的兵员，达到了按编制有八九成的人数。为了使官兵能耐艰苦，射击准确，善于攻坚，及能打运动战，我们掀起了一个练兵运动，也常住到各师团部里督促和鼓励。在大理、永平、保山等9个县的各村庄里，大部分都住有部队。走到任何一个单位（不管是团或营，甚至一个独立排），都可以看到住的地方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个连或独立排都有自己的讲堂，这种讲堂形式不一，主要的材料就是泥土，都是士兵们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各种练习射击的设备，有各种式样的沙盘，有各种作业（例如坑道作业等）的模型。除了基本教练外，经常举行班排连营的对抗演习，有时完全是实战（双方都全用实弹），攻击堡垒、爬山、夜间演习等等。部队住在滇西这样偏僻的地方，农村风气淳朴，官兵很少有从事赌博及其他不正当娱乐的。一般都是锻炼身体，练好本领，这就为以后的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成立大理干部训练团。我于五月间在保山看见从腾冲、龙陵跑出来的一些中学生及从缅甸回来的一些华侨青年，他们因受战争的影响，大多没有钱，不能到昆明等地去继续就学，而又无其他出路，流浪街头，衣食困难。我曾派员收容他们，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随后想到将来反攻缅甸需要用大批工作人员，何不开办一个训练班收容他们，并扩大招收一批滇西青年，施以一个时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派到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运济粮秣、侦察敌情，对配合作战能起一定的作用。经过同林蔚商谈，得他同意后，我随即拟了一个具体方案送给他转报到军委会，不久就批准了，定名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到1943年5月，由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成立，改称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团长名义上由蒋介石兼任，副团长为龙云、李根源（后由陈诚继李根源），我兼任教育长，董仲篔任副教育长。地点选择在大理的三塔寺营房，8月下旬正式成立，招收的学生共1100多人，编组为一个总队，下辖3个大队。确定团的教育方针为“对滇西青年施以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培养他们成为保家卫国的干部”。训练期定为1年。训练课程，政治与军事并重，有一个大队较为偏重于军事教育，因为预备派到部队去充当下级干部。当时在政治教育方面，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是以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思想体系为依据来灌输给学生的。所以这个团虽有鼓励青年争取抗战胜利的积极性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个团于1943年1月曾邀请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罗常培、张印堂、蔡维藩等人到大理来讲学；他们对于促进滇西的文化发展和鼓舞青年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一些作用。这个团到1945年3月结束时为止，共办了两期。先后在这个团受过训练的学员共约两千人，除一部分派到各军师充当排连级干部外，大部分就其原籍编组成许多小队派到滇西各县去做地方工作；并有一部深入到滇缅边境的江心坡、片马、拖角、盏达、陇川、孟卯、耿马、卡瓦山等地区工作。这批学员对1944年的反攻胜利，

是有一些贡献的。

四、反攻的筹议和规划

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一部分被日军侵占后，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重庆国民政府大为焦急。史迪威于1942年7月18日送给蒋介石一份备忘录，提出反攻缅甸的意见，蒋介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随后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到重庆，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又致函何应钦提议中国应向英美要求向缅甸进攻，打通中印交通。何应钦将孙科的信也交军令部办理。军令部随即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曾由蒋介石和威尔基商谈。方案大纲摘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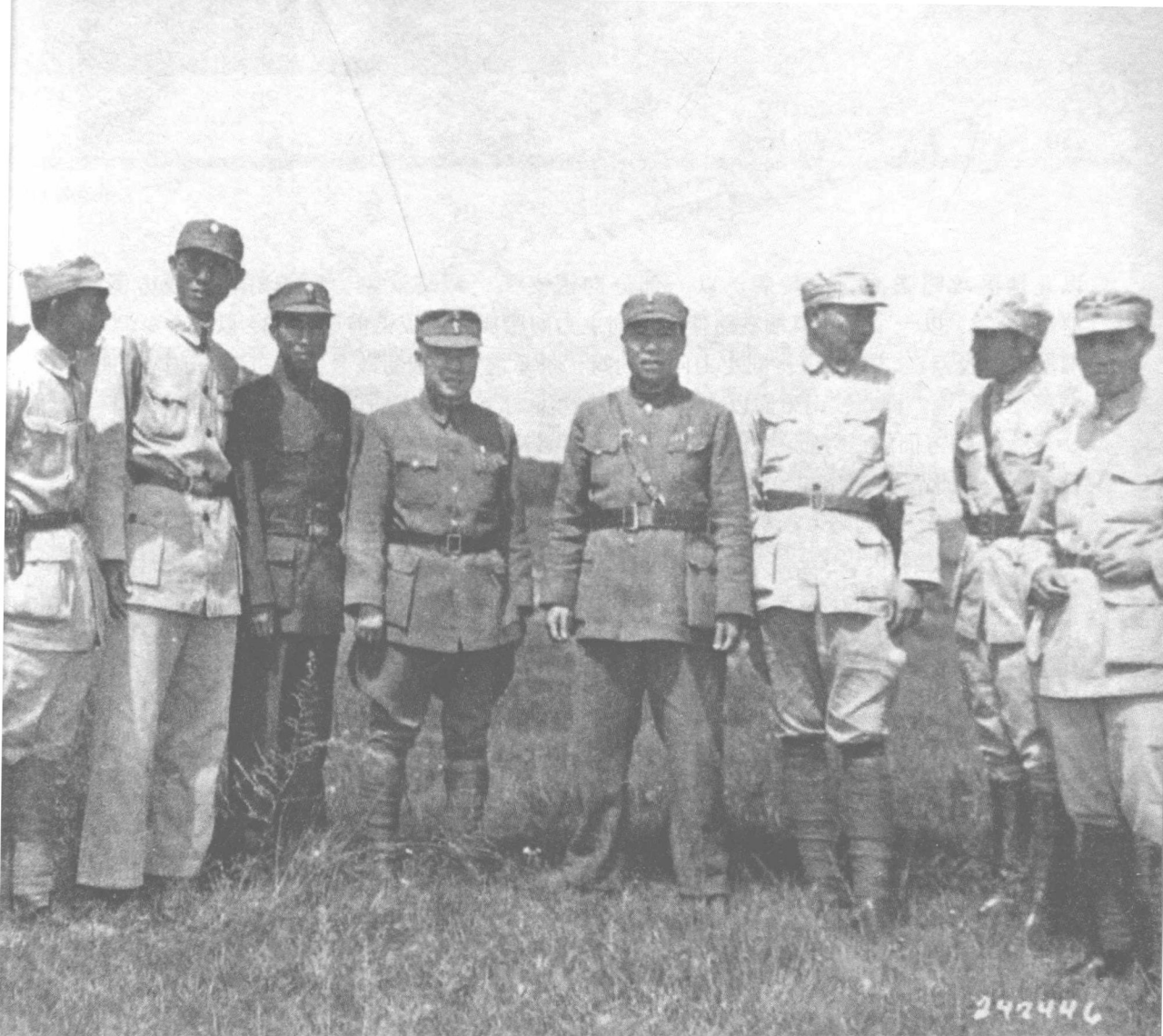
甲、反攻缅甸的理由：（1）规复缅甸可建立反攻日本的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2）可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轴心国会师远东的企图。（3）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的准备。（4）牵制日本陆海空军，使不能再行增辟战场（如对苏对澳或袭击美国）。

乙、缅甸方面敌军兵力判断：（1）陆军现约5个师团，将来增加到10个师团为最大限度。（2）海军现新加坡以西亘孟加拉湾，似尚无主力舰，将来可增加至其全部舰队四分之一为最大限度。（3）空军现缅甸约有飞机150架，将来其第四飞行师团全部（约800架）协力该方面作战为最大限度。

丙、作战准备：（1）中国陆军以15至20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英美军以5至7个师兵力及一部降落伞部队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准备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登陆攻击敌人。（2）英美联合海军以主力舰3至4艘、航空母舰6至8艘为基干，特别须编入多数的潜水艇，准备确实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登陆。（3）英美联合空军以能确实击破敌人一个空军师团为对象而准备之。（4）美国应设法加强中印间空运力量，尽先输送中国出击部队所要的装备及其他必要的物资。（5）英国应迅速准备开设印缅边境的交通路。

丁、作战指导大要：（1）英美联合空军先攻击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掩护海军作战。（2）英美联合海军先以有力潜艇舰队进出中国海及爪哇海，截断敌海上交通，尔后以海军主力攻略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登陆。（3）中国陆军在盟国空军掩护下，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向缅北之敌攻击。（4）英美中联合陆军以主力渡清德温江向斯威堡、曼德勒方向，以一部沿吉大港海岸向阿恰布、仰光方向攻击，另以一部在海军掩护下由仰光登陆攻击敌人。

到1942年11月10日，蒋介石命军令部次长林蔚、刘斐及第一厅厅长张秉均同史迪威就反攻缅甸计划进行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对泰、越、马、缅方面的敌陆海空军势力的估计，中英美联合军反攻的目标；双方一致同意对泰、越取守势，对缅甸取攻势；中国方面拟使用的兵力及部队的选定；补给、交通、卫生等方面的整备等等。会谈纪要送交蒋介石后，蒋介石



中国腾冲：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和他的部属在攻克腾冲庆祝大会后合影留念（左二为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将军，左三为一一六师师长赵镇藩将军，左四为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将军，右三为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将军）

石批“可照谈话结果积极准备进行，但留守滇省与昆明防守部队必须增派一军，尤其要增强昆明的实力，必须要有三个军防守昆明，应即筹划在第六战区或第九战区再抽一个军限明年二月以前到达昆明”。从蒋介石这一批示，可以看出蒋介石和龙云间矛盾的尖锐，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已蓄谋解决龙云（关于此事，详见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经过》一文）。

紧接着，军令部于11月28日颁发了一个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约以九个师团为基干之敌，分布于我滇西及缅泰越方面（滇五个师团，泰越各两个师团），有待机扰滇犯印的可能。英美盟军及我驻印军正在印境加紧整备，适时与国军协力规复缅甸。

2. 国军以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美英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东之线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须于明年（1943年）2月底以前完成之。

关于国军的部署概略如下：甲、滇西方面：（1）以三个军又一个师沿滇缅公路及其

以北地区攻略腾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主力向畹町、腊戍方面攻击前进。(2)以一个军沿滇缅铁路便道协同主力向腊戍方面攻击前进。(3)以一个军沿车里、佛海大道及双江、猛脑道协同主力向雷列姆、景东前进，威胁敌之侧背。乙、滇南方面以3个军守备国境。丙、桂南方面以一个军守备国境。丁、昆明方面以两个军担任防守。

3. 滇西方面的后方勤务，应由后方勤务部部长派定专员负责，并加强机构；关于兵站的设施，应使野战军于腾冲、龙陵、滚弄、打落间地区会战时补给圆滑，同时并须准备向八莫、腊戍、曼德勒、雷列姆、景东各方面分别延伸设施，能适应时机补给而无遗憾。

除上述大纲外，还写有方针、指导要领、兵团部署、航空及防空、交通通信、兵站整备要领等项较为具体的办法。

关于兵团部署方面，是以我所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为进攻部队的主力，其部署的重要内容如下：

1. 第十一集团军以第二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及预备第二师与怒江西岸的游击部队编成。

2. 第二军应由双虹桥、马料铺附近渡河，依预备二师的协力，一举攻略腾冲，尔后扼守腾冲以西诸要隘。

3. 第七十一军应由惠人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龙陵，尔后扼守放马桥附近要隘。

4. 第九十三军随第一线攻击部队的进展，适时向龙陵附近推进。

同时另派第三十二军以一部向龙陵、芒市间游击及破坏交通，并对滚弄附近之敌严密监视。

第十一集团军攻取腾冲、龙陵后，应先扼守曩宋关、放马桥之线整顿态势，尔后依上述之部署行动：(1)预备第二师以主力向密支那、一部向片马、拖角攻击前进。(2)第二军向八莫攻击前进。(3)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先向畹町进出，尔后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三十二军驱逐滚弄附近之敌人后，协同第十一集团军主力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六军以主力由双江附近渡过萨尔温江向雷列姆方面攻击前进，以一部于攻略景东后，向泰国严密警戒。

军令部策定这项计划后，第二军王凌云部（下辖第九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随着其主力由泸州经昆明，其一部（七十六师）由西昌到祥云，开入滇西。第三十二军及九十三军，因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坚持不放，并未按计划进行，这两个军始终没有开入云南。

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和后勤部曾于1942年12月电召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车蕃如及滇西地区的补给司令（当时称为兵站分监）李国源到重庆开会，就军令部所作的计划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讨。

这个反攻计划原定于1943年夏季开始实施，但因英美绝大部分陆海军用在欧洲战场，不能抽出必要的兵力，而中国方面关于兵力的集结、装备的充实（尤以炮兵很缺乏）及后勤设备等，亦均未准备就绪，因而延期实行。



五、成立司令长官部和装备美械

1943年4月，蒋介石命令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调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随后，陈诚带了一大批人员来到云南，设立他的长官部于楚雄。陈诚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的作战地境是湖北的西北部及湖南的西部地区，负有拱卫重庆政府的责任。陈诚去云南后，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仍由他负责，只是由他分别派人暂时代理。当时在云南方面并没有设立这种所谓“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必要。因为滇西地区人口较少，物产不丰，粮食的筹补运输也有困难，所以这个地区是不适于大兵团作战的。敌人也只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扼守怒江西岸各要点。我方以三至四个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充实他们的装备和必要的炮兵，并辅之以空军的支援，尽可实施反攻的任务。原来军令部所策定的方案，比较合情合理，为什么又突然要设立这个远征军司令部呢？主要原因是：

1. 陈诚好抓权。陈诚自1929年当第十一师师长，到1930年当第十八军军长起就开始抓权。直到1946年他充当国防部参谋总长，在这将近20年的时期中，他依仗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排斥异己，吃掉了许多的部队而使之“十八军化”，也就是拼命扩大陈诚系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史迪威和美国方面洽商，决定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十二个军（36个师）的美械装备，而当时拟定要装备的军队，大多在云南。喜欢抓权的陈诚是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的。

2. 蒋介石的私心和对龙云的控制。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开入云南这样多的部队，又加以要美械装备，蒋就觉得非他真正的心腹来负责不可。1943年冬陈诚病重不能继续干下去了，蒋才无可奈何地派卫立煌接替陈诚的职务（卫立煌正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才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撤销下来的）。同时蒋介石和龙云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最害怕龙云有异图，动摇他的统治。设立这样一个长官部，又派陈诚来担任司令长官，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即可以削弱龙云的势力。而司令部又设在昆明附近的楚雄，更能就便控制龙云。

关于美械装备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实施美械装备的部队计为：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四军。

以上共12个军，内中可能有一两个军的番号与当时的实情不符，尚待查证。

每军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厘米的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1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厘米的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1个战车防御连，配备战车防御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二”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火箭排，配备“伯楚克”式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18支，“六〇”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火焰放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每个师部都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1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两用机等。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等。可以看出，这和

国军原来的装备比较起来，是要完备得多，尤以火力方面更是大大加强了。

听说还有一些部队，如卢汉所属的第六十军，关麟征所属的第五十二军，都是半美械装备，内容如何，我不大清楚。

关于这些美械装备如何配发到部队，何应钦的军政部和美国人方面有过一番尖锐的争执。军政部方面说，所有中国军队的装备和发交的办法，是属于军政部职权范围的事情，美国应该将全部装备交军政部处理。美国方面则认为这些装备应尽快地送交部队，使部队官兵学会使用这些兵器，才能早日完成训练，准备反攻。他们认为军政部的工作效率低，因而坚持不肯交军政部接收。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经蒋介石同意由美方直接送交各军师接收，并由各军接收后将各项装备数量报军政部备查。

美国人方面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除了主要的是史迪威对军政部深为不满，认为军政部腐败，工作效率太低（后面还将谈到）；此外，可能还有一种较为深远的用意，就是想以此讨好各级干部，使这些干部对美国产生好感，甚至发生直接联系；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一贯手法。

六、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和蓝姆迦训练学校

有了美械装备，就得请美国人来对干部进行教育。因此蒋介石于1943年4月在昆明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后又将大理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名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前已叙及）。

驻滇干训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龙云、陈诚兼任副团长。头一个时期陈诚经常住在团内实际负责。担任教育长的，先后有杜聿明、关麟征、黄杰、梁华盛四人。

干训团的地址设在昆明的北校场营房里，先后举办过步兵训练班、炮兵训练班、工兵训练班、通讯训练班、战术训练班（又称参谋训练班）。步兵训练班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黑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昆明附近的干海子；其余设在北校场营房。

这个团训练的对象为部队副团长以下的营连排级干部。除炮兵外，按所属兵种分别到步兵、工兵、通讯各训练班受训。参谋人员和团副或营级干部入参谋训练班（即战术训练班）。炮兵训练班是将各军的炮兵营全部调来昆明装备（当时有许多驮炮的骡子，系在印度买的，由美机装运到昆明，一直到训练完成后才归还各军建制。

训练时间除炮兵外，一般均为六个星期。依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每个班队凡报到满一百人即开始训练，训练六星期即结束；所以几乎每个星期甚至三五天就有一批毕业的。

训练的方法是根据各个兵种的情形决定。占主要地位的步兵训练班，都是第一、二周为兵器训练，使受训者了解各项兵器的名称性能并善于分解结合；第三、四周为射击训练，使受训者善于使用各种兵器来发扬火力；第五、六周为战术训练，通过沙盘教育和班排连的实兵指挥，使受训者了解如何确实掌握和运用自己指挥的队伍以发挥战斗力量。

通过这样的训练方式，在1943年、1944年两年中先后训练约达1000人，内中包括一部



分士兵。

另外在大理分团内还办了一个军医人员训练班，也是将部队中的医务工作者轮流调训，训练期也是六个星期，先后有四百多名的医务工作人员在这里毕业。

蓝姆迦训练学校也是1943年在蓝姆迦设立的。蓝姆迦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方约二百公里，英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所相当大的营房，驻印军总指挥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都驻在这里。除驻印军的干部轮流入这个学校受训外，在中国境内受美械装备的十二个军的军师团级干部，都要到这个学校来受训。这些军师团级干部先到昆明干训团报到，然后一批一批地搭乘美国的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列多，再乘火车前往蓝姆迦。在蓝姆迦训练学校受训的时间也是六个星期，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同昆明的步兵训练班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昆明、大理和在蓝姆迦所办的多种训练班所进行的训练，几乎所有的教官都是美国人。在行政管理方面，原来美国人打算直接控制，因为语言不通，又找不到这样多的翻译，才把管理的任务交中国人负责。

七、美国人和英国人

自1941年美国陈纳德组织一个自称为“飞虎队”的志愿空军驻在昆明起，随后这个志愿空军又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扩大了它的组织，拥有在昆明、沾益、陆良、洋街（在嵩明县境内）、云南驿（在祥云县境内）五个空军基地。1942年史迪威的司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来到昆明。1943年，美国人就来得更多了，有办理后勤的大批工作人员，有修路的工程队，有派到各集团军担任联络的参谋人员，有派到昆明干训团担任教学的大批教官，有派到各师野战医院工作的大批医务人员，还有美国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拍摄电影者……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东自沾益，西至保山，美国的卡车、吉普车，川流不息地奔驰着。昆明金碧路、正义路、南屏街等几条大街开设了好些专供美国人吃喝玩乐的跳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西餐馆。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有许多商店里都是美国货，各种衣料、化妆品、玻璃丝袜、尼龙手提包、香烟盒、牙膏、牙刷、巧克力糖、口香糖、香烟、白兰地酒……真是应有尽有。

“发财”，是美国人的最高信条，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抗战到了1943年，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物价飞涨，币值低落，许多人都在极端穷苦的情况下生活着。而官僚买办阶级都很快就和这些美国佬勾结起来，利用美国空运援华物资的便利，把大量的外国货从飞机走私运进来。在史迪威司令部有一个后勤司令（忘其姓名）利用他的职权专干这些勾当。他不仅运货，而且大做其黄金买卖，经常用子弹箱换装上印度的金币——“托拉”，运到昆明来大赚其钱。他的侄儿是个宪兵，在飞机场执行检查任务，这就给他走私以更大的方便。也许他们内部分赃不匀，有人向史迪威告密，史迪威命宪兵队长严密调查。有一天，宪兵队长来到机场，当一架运输机降落后，看见那走私宪兵搬着一个木箱上吉普车立即开跑，宪兵队长马上开车追去，一直追到那个后勤司令的公馆。宪兵队长盘问那个宪兵箱子装的是

什么，那宪兵吓得脸无人色，吞吞吐吐地说是子弹。宪兵队长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整箱耀眼的黄金——“托拉”。这样，那位后勤司令就不得不被押解回国了。这件走私案1943年曾经在昆明轰动一时，然而也不过只是千千万万件中的一件而已。美国佬发财的窍门很多，还和昆明的商人勾结起来套购外汇，买卖美钞黄金，投机倒把，以及盗卖军用物资等等，更是层出不穷。

“女人”“享乐”，是这些美国佬的第二信条。在昆明有一批坏蛋，利用人民生活困难，专替美国佬物色一些中国的妇女供他们淫乐。离昆明北面有一座山，名字叫作“金殿”，听说是明末招引清兵入关、扼杀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大汉奸吴三桂为爱妾陈圆圆修建的。在这个殿的周围有茂密的树林，成为这些美国佬淫乐的场所。他们在白昼用吉普车装载妓女来此，还不能满足兽欲，更要到处乱闯，乱找女人。在咖啡馆、跳舞厅，为了争夺女人而打架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次，一个在步兵训练班当助教的美军少尉，在黑林铺的一家酒店里硬要一个中国军官给他找女人。那中国军官感到侮辱，向他申斥了几句，美国少尉就开枪打伤了中国军官。强奸妇女的事，经常发生。其中尤以六个人轮奸华侨符瑞生的妻子，令人发指。华侨符瑞生原在缅甸经商，因仰光陷落，率眷回国，在滇西的下关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有一天他和妻子向一辆美国的大型吉普车要求搭车前往昆明，那些美国人（共六人）满口答应，等到符妻刚刚上车，车子就飞快开走，开到祥云东边一座大山的天子庙附近时，六个美国佬拖着符妻走进树林，实行轮流强奸。这些家伙的兽性发泄后就开着车子一跑了事。符瑞生当自己被撇下的时候，知道事情不妙，连忙另搭上一辆车向前追赶，赶到天子庙发现他妻子已被美国佬强奸得只有奄奄一息了。随即将她扶上汽车送往昆明，在甘美医院住了两个月才好。当时在当局的压力下，知道的人不敢声张，至于那些地方官吏更是一切仰美国人的鼻息，更谈不上什么追究。符瑞生夫妇唯忍气吞声而已！

在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坏蛋。他们的社会成分是各种各样的：有职业军人，有资本家，有商店职员，有大学教授，有中国教员，有工人，有农民，还有许多自由职业者——医师、会计师、律师等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政府征召施行短期的军事训练和业务训练后派到中国来工作的。在我们的集团军司令部负责整个集团军医务工作的汉森上校，和我共事两年，对伤病兵的救治热情亲切，无论对军人或滇西老百姓，丝毫没有轻视和傲慢的态度。他从不胡闹，甚至连一滴酒也不喝。像他这样老实规矩的人也是有的。

在远征军司令部里担任联络参谋组组长的窦尔恩准将（后在台湾蒋帮任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窦恩少将，依我推测可能就是这个人），可说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出身于美国的西点军校，具有深厚的霸权主义思想。1944年在云南保山，他就对我说：“打败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了，今后世界要认真地对付俄国人。”他又说：“拿破仑和希特勒进攻俄国都失败了，要认真研究他们失败的经验。俄国的气候严寒是一个特点，在装备上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他处处表现白种人的优越感，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同坐一辆车由保山去惠通桥，他对我说：“这些地方多穷啊！”在开会时，他总是喜欢夸耀美国的物质力量。同时这个家伙也显得十分狡猾，常常说过的话不承认，答应办的事情又不办了。



当时在远征军的系统里，自远征军司令部至各集团军、军、师、团，都派有美国人，名称都叫作“联络参谋组”。每个步兵团有一个中上尉级的军官和一至两个军士，带有无线电报话机一部。军部或师部的联络组，一般是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中少校军官。在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组，每组都有20多人。第十一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吴德上校，第二十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康德上校。自集团军至军、师、团，他们都自己佩戴无线电机，在集团军总部还有一部雷达机，专供对空联络之用，经常用一块帆布包着，由一个少尉专门负责严密保管，不让中国人看见。在这些联络参谋中，真正的职业军人仍是少数。在各个野战医院都有不少的美国人在工作着，内中有好些是在美国生长的中国人。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们却很少有人能说中国话。

这许多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十分喜欢战利品，凡属从日本人身上得来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水壶或一顶帽子，他们都拼命地追求着，常常拿自己抽的香烟、吃的糖果或其他用品向前线的军官和士兵们去交换战利品。有一次我把前方部队缴来的一把日制军刀送给吴德上校，他简直高兴地跳起来。尤为有趣的，在1944年7月间我们住在龙陵附近的廖家寨，那时正值雨季，经常下着大雨。有一天4架日本的飞机给困守在松山的部队投送弹药，因天气恶劣找不到松山，就在上空兜圈子，当时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就将对空联络的布板打开，有两架日本飞机没有看清楚，立即投下了4个降落伞（随即他们发现投错了，就没有继续投）。在我司令部的20多个美国人高兴极了，把4个降落伞全要了去，每人分一块保存着。我曾问过几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我拿回去挂在家里的客厅里，请亲友来参观，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这里再谈谈史迪威。

我和史迪威曾经见过四五次，有两次谈话，给我的印象较为深刻。一次是在1942年的春天，他住在昆明西门外农业专校的楼上，我是和关麟征同去看他的。这次谈的多侧重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他对于战争前途是乐观的。另一次在1943年的春天，我和他都在昆明，他约我去谈谈。首先他向我了解滇西战场的一般情况，接着就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说了许多批评的意见，政府机关腐败无能，行政效率很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等等。随后当我提出军政部对兵员补充器材补给异常迟缓等情形时，他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把手一甩，用中国话大声地说：“坏透了！坏透了！太腐败了！太腐败了！”接着他举了好些事实对军政部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美国送给中国的大批物资，是美国纳税人出了钱的，一交到你们的军政部就公开盗卖，如药品、电讯器材等，街上都可买到。你们的政府这样糟，怎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呢？这叫罗斯福总统怎样对美国人民说话呢？”

1942年7月我在保山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大使馆的副武官柯勒克上校由重庆跑到保山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一餐饭，并问他到滇西来干什么，他含糊地说，他只是想来了解一下滇西战场的情况，并没有具体任务。我当时也信以为真。到是年的11月我在大理（那时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大理）的时候，他又来了，并且带了一个端纳少校同来。他对我说：“英国驻印度的总司令很希望和贵集团军建立联系，交换关于缅甸日军活动的情报，英国政府已向贵国提出在大理设立一个联结站，今后就由端纳少校负责，请宋将军多予协助。”我随即打电报